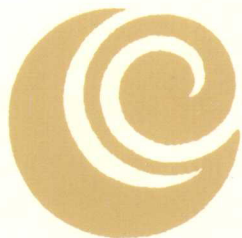


中国农村研究书系·政治系列



SHENGCUN ZHENGZ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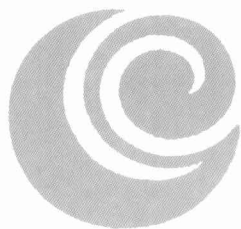
生存政治： 国家整合中的农民认同

以1950—1980年的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

彭正德◆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农村研究书系·政治系列



SHENGCUN ZHENGZHI

生存政治： 国家整合中的农民认同

以1950—1980年的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

彭正德◆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存政治：国家整合中的农民认同 / 彭正德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5

(中国农村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04 - 8827 - 9

I. 生… II. 彭… III. ①农民 - 生存理性 - 政治认同 - 研究 - 湖南省 IV. ①F321. 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4316 号

责任编辑 鉴传今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80 1/16

印 张 24.5 插 页 2

字 数 375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 勇

副主编 项继权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建嵘	石 挺	刘菽红(女)	卢福营
邓大才	宋亚平	李德芳	吴 琦
吴理财	项继权	徐 勇	唐 鸣
高秉雄	曹 阳	曾菊新	董江爱(女)

出版说明

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迁，也成为学术界最重要的学术对象之一。我们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人员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从事农村基层政权研究，1990 年前后由四川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农村基层政权研究系列丛书。20 世纪 90 年代，我们的研究重心主要为村民自治和村级治理，并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村治书系”。到 21 世纪初，我们的研究领域由村治扩展到乡村治理，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乡村治理书系”。现在，我们决定以“中国农村研究书系”作为本中心长期使用的学术品牌。其理由：一是自 2000 年本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来，其研究内容大大扩展，不仅以乡村治理为研究重点，而且涉及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农村文化、农村教育、农村历史等。原有的书系名称已无法涵盖现有的研究内容。二是学术研究贵在持之以恒，更在于是一项以探求学理为唯一使命的事业。中国的学术由于一直伴随着问题而经常非学理化。“三农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中国农村研究”作为本中心一个长期使用的学术品牌，将致力于中国农村的实证调查和学理研究，以此标志我们进一步的学术自觉。

编委会
2005 年 5 月

总 序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文明大国。

中国是一个世界农民最多的大国。

中国是一个正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急剧转变的发展中大国。

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世界性难题，也是中国的世纪性难题。20世纪以来，中国在解决这一世界性和世纪性难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过惨痛的教训。进入21世纪，农村和农民问题还将存在，并会呈现出新的特点。一个古老农业文明大国迈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程如何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事，也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广阔的空间。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组织撰写、编辑、出版“中国农村研究”丛书。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心人员就致力于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1990年前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农村基层政权研究系列丛书”，1992年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了《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1995年由武汉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等专著。1990年代后期，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村治书系”（一套10本）。21世纪初，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乡村治理书系”。2005年，我们决定以“中国农村研究书系”作为本中心长期使用的学术品牌。

我们撰写、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主要目标有四个：一是观察、记录、研究中国农村的变革历史；二是研究中国农村变革发展中的问题；三是挖掘和培育中国农村实证研究学者，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四是建设中国农村研究学者交流对话的平台，特别是为学者们立足中国本土经验，建

构既能够解释中国农村，又能够解释世界农村的分析框架提供交流和对话的平台。

鉴于这个目标，“中国农村研究”丛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中国农村研究”丛书以经验研究为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实证研究见长，过去以定性经验研究为主，近几年随着“百村观察”和“中国农村数据库”的建设，计量实证研究也开始起步。“中国农村研究”丛书的经验性成果既包括田野调查成果，也包括在历史的“田野”中调查的成果；既包括定性经验研究，也包括定量经验研究；既包括案例研究，也包括计量研究。

“中国农村研究”丛书以跨学科研究为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是教育部综合性的农村研究基地，以研究农村政治问题为主，同时研究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我们期望从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视角解剖中国农村、研究中国农村，形成对中国农村的整体认识。因此，“中国农村研究”丛书也烙上了跨学科的烙印，不仅出版的成果具有多学科的特点，而且大多数成果打破了学科壁垒，跨跃了学科界限，运用了多学科的方法研究中国农村问题。

“中国农村研究”丛书是中心成果的展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走过 20 年的历程，形成了独特的研究风格——实际、实证、实验，即“三实”研究风格。中心的研究正处于一个从方法论的自觉阶段转向自为阶段、从理论建构的洞察力阶段转向概念化阶段、从粗放式研究阶段转向精致化研究的阶段。“中国农村研究”丛书将集中展示中心及其学者的转型研究和最新研究成果。

“中国农村研究”丛书具有开放性和发展性。“中国农村研究”丛书是一个开放式的平台，具有发展性和持续性。“中国农村研究”丛书将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中心的学者的著作为主，同时吸纳优秀的中国农村实证研究成果。我们希望，“中国农村研究”丛书能够变成中国农村研究学者、各个学科的学者对话的平台。丛书将在中心“三实”的宗旨的指导下，长期撰写、编辑、出版中国农村研究的优秀实证研究成果。

“中国农村研究”丛书与“中国农村调查”丛书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两类主要的系列丛书。“中国农村调查”丛书包括四个

子系列：一是中国农村调查·名村系列；二是中国农村调查·名人系列；三是中国农村调查·调查报告系列；四是中国农村调查·咨询报告系列。“中国农村研究”丛书与“中国农村调查”丛书是中心的两类姊妹丛书，前者以学理为主，后者以应用为主；前者以个案研究和计量研究为主，后者以调查报告和研究报告为主；前者立足实践，但超越实践，后者立足实践，也服务实践。

作为学者，作为教育部综合性的农村研究中心，我们有自己的学术理想和理论抱负，希望通过中国农村研究丛书的撰写、出版，促进中国农村实证研究的发展，促进中国农村实证研究学者的成长，同时在研究发展中形成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农村实证研究。

徐 勇

2010年5月12日于华师桂子山

序

徐勇

当今世界在总体和平中存在局部性动荡不安，当今中国在总体稳定中也不断出现群体性事件。认同与反抗作为一种分析理路也因此成为学术界的前沿问题。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就是以认同与反抗为主题的著作。

本书以中国农民的反抗与认同为研究对象。这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世界无与伦比的现象：一是创造了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农业文明，据称直到19世纪，中国还是世界上GDP最多的国家；二是传统整体国家的统合能力无与伦比，早在2000多年前就构造了整体性国家；三是中国农民反抗的规模和频度也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而这三者之间必然有内在的关联。秦始皇统一中国之时，产生了一家一户生产的自耕农，或者为小农，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与此同时也开创了农民大规模反抗的历史。

与西欧社会的依附性农奴相比，中国的农民是在小块土地上经营的小农。小农的特点是人身自由、自给自足，伴随的是力量单薄、弱小。早在1992年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一书中，我就概括了中国传统农民在政治态度上的两极化特点：逆来顺受与官逼民反。在世界上，很难找出有中国农民那样极具忍耐力的农民；同时也很难找到有中国农民那样极具反抗精神的农民，“该出手时就出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农民忍无可忍，铤而走险，冒着生命危险而反抗呢？是生存！

农业文明的特点是生存文明。受自然因素的制约，农民的生存条件十分简单。他们的最高愿望是使生命能够得到延续，包括自我生命和个体生命的繁衍。“吃”和“生”是中国农民的头等大事。“民以食为天”。吃饱饭，使生命得以延续，是国人“天大”的事。正如马斯洛所说：“生活

本身的意义就是吃，其他任何东西都是不重要的。”皇帝虽然贵为“天子”，也得服从农民心目中的“天”。生存，是农民政治认同的基点。农民遇天灾人祸，没有“饭”吃，必然会“反”；遇“苛政猛于虎”，被逼无路，也不得不反。临界点就是生存。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他们面临的局势是继续行走在服役的路上因误时必死无疑，造反也可能是一条死路，其选择的结果是不如造反。这就是农民的生存理性。

农民的生存理性可以说是支配中国农民行为的基点。这种理性是环境所使然。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适应了农民这一理性选择，以革命的方式满足了农民对土地，更确切地说是对生存的渴求而争取到农民的支持，并取得了国家政权。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正处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之中，农业和农村是工业积累的源泉。尽管农民是新政权的依靠力量，但他们也受到了结构性伤害——为成就工业化大局而贡献、牺牲其相当部分利益。如统购统销、农业税、户籍制将农民牢牢限制在土地上，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使农民利益受损。特别是由于“天灾人祸”，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出现了大规模农民非正常死亡的惨况。农民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也迅速流失。正因为如此，农民以其特有的方式对不能满足其基本利益要求的政策和体制进行创造性“反抗”，这种体制性突破最终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大幕。支配农民这一行为的，仍然是农民的生存理性。彭正德的著作以1950—1980年的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对这一期间的农民反抗与认同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特别是该著作围绕“生存”这一主题展开，分析了农民反抗与认同的根源——基于生存，提出了农民的生存政治学，由此将著作从个案材料层面提升到学理研究层面。读者既可以从书中了解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信息，更可以得到理论上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解决了“天大”的问题——吃饭问题，一般农民的生存已不是基本问题。但我们也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群体性事件也在不断增多，反抗与认同仍然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本书没有论及，但我觉得正是需要继续探索的。农民没有饭吃，要反，有了饭吃，为什么还要反呢？“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何以大量存在？

群体性事件为何频频发生？这需要进一步理解农民的理性。

理性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环境的产物。农民的生存理性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生存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生理、生命意义上生存，是个体的存在；二是生活、社会意义上的生存，是个体的存在质量。传统农民的生存理性主要是第一个层面，个体生命的存在是他们认同与反抗的基准。他们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绝对贫困、物质匮乏、民不聊生，采用的反抗方式往往也是极其强烈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他们的生存理性已由第一个层面向第二个层面跃迁。他们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相对贫困、权利匮乏、城乡差距、期望和能力的冲突等，由此滋生出不满情绪。这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他们能吃上肉是巨大的进步，当他们吃上肉后提出进一步要求，要求得不到满足则会骂娘，这同样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由此就为执政党和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免于农民对物质匮乏的恐惧，更要着力建构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使他们能够获得平等的国民待遇，从而建构农民新的政治认同。当农民能够作为一个平等的国民存在，他们更多的是对国家的认同而不是一味的反抗。而这正是当下执政党和政府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也是学术界有待探讨的问题，期待本书的作者对此作出进一步的研究。

本书是在作者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作者是硕士生毕业在高校任教的青年教师。他与他的直接指导老师——于建嵘同是极具反抗精神的湖南同乡，同出一所极具反抗精神之地的高校。他选择这一题目做研究，我以为与其个体生命和所在环境相关。近代以来，“湘人好反”天下闻名。百多年来，为何湘人好反，盛产革命家？为何在盛产革命家的地方，又大量生产和再生产着革命的对象？同样姓曾，百多年前的曾国藩是一代儒帅；而本世纪的曾姓纪委书记却犯下杀头之罪？这都不是简单的几句话，或者一篇学位论文，甚至几部著作能够说清楚的。所以，在作者就读期间，我反复告诫要重理性分析、重实证调查。这两个方面看来作者都注意到了，为此也下了很大功夫，克服了诸多困难。他写博士论文期间，正值妻子怀孕生子，自己还担任教师工作，只能挤出时间去做田野调查和文献查阅。当然，如果时间更充分一些，其博士学位论文的资料可以更翔实一些，研究思路可以更开阔一些。

学无止境。作者的博士论文为其研究开了一个好头。在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学位以后，他以同样的选题很快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我相信，在接下来的研究中，作者会取得更为显著的成就！

2009年7月22日观看数百年难遇的日全食之时
于武汉“闲心斋”

目 录

序	徐勇 (1)
导 论	(1)
研究意义与研究回顾	(1)
研究样本与研究方法	(9)
基本概念与本书结构	(18)
第一章 翻身：农民政治认同的形成	(26)
土地改革前农民的生存状态	(27)
诉苦：阶级意识的觉醒	(38)
划成分：政治身份的获得	(53)
斗地主与分果实：经济欲望的释放	(69)
经济动机与政治目标的契合	(86)
第二章 徘徊于小农经济和社会主义之间	(95)
组织起来	(96)
统购统销中的无奈与“反抗”	(108)
入社与退社	(121)
“躲社会主义”	(136)
生存理性的显与隐	(151)
第三章 饥荒中的生存	(160)
陷入饥荒	(160)
遭遇强迫命令	(173)
寻求生存	(191)
受伤的政治认同及其恢复	(202)

第四章 集体制度下的“反抗”	(212)
反对干部不正之风：制度规范的运用	(212)
“坐大船”：理性选择的困境与突破制度的努力	(232)
“化公为私”：集体制度下的自利行为	(245)
打破平均主义：政策松动下对生产责任制的探寻	(257)
政治认同的理性化及其高涨	(272)
第五章 生存的政治学意义	(278)
国家整合与农民政治认同建构	(278)
生存危机	(290)
作为生存理性的反抗与认同	(307)
生存政治学：内涵与意义	(325)
结论：生存理性支配下的农民政治认同机制	(335)
参考文献	(348)
后 记	(374)

导 论

研究意义与研究回顾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和社会阶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时期的改革开放都是首先从农村取得突破，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其执政环境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到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转变，整个过程都与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没有农民的支持，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同样，没有农民的拥护，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农民阶级的重要性历来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在革命年代，毛泽东就深刻地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①在改革时期，邓小平的认识非常清醒：“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②

农民之所以在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变革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时期中国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而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美国现代化理论家布莱克认为，所有现代化社会都面临着现代性的挑战、现代化领导的稳固、经济和社会的转型、社会整合四个阶段，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意味着经济增长和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社会变迁达到这一程度：社会从农村和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转向城市和工业为主的生活方式。^① 对于现代化，亨廷顿有一个经典的理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② 现代化过程的动乱与农民反抗密切相关，因为现代化通常给农民带来两个重大冲击，其一是“使农民劳动和福利的客观条件恶化”，造成农民的贫困。其二是“最终也导致了农民的渴望上升”，农民的贫困化与渴望上升之间的矛盾往往带来农民的暴力反抗。^③ 因此，亨廷顿认为，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如果农村支持该政治制度和政府，那么，该制度自身就可免遭革命之虞，政府也有希望使自身免受遭叛乱之虞；如果农村处于反对地位，那么，制度和政府都有被推翻的危险。“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对政治体制来说，城市内的反对派令人头痛但不致命。农村的反抗才是致命的。得农村者得天下。……如果农民默许并认同现存制度，他们就为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如果它积极反对这个制度，它就会成为革命的载体。”^④ 对于执政者来说，若要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就必须稳固地获得农民的认同并有效地消除农民的反抗。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共产党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给广大贫穷的农民分配了土地，并将农民吸纳为新政权的阶级基础，彻底改变了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政治、经济地位，后来又在农村实施改革，领导农民致富奔小康，因而从总体上看，随着经济的增长、民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农民的政治认同保持了较高的水平，维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是，现代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农民的弱势群体化，而且国家通过加大对农业的提取以积累工业化资金的政策导致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善缓

① [美] C. 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0 页。

② [美]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38 页。

③ 同上书，第 270—271 页。

④ 同上书，第 266—267 页。

慢，甚至在某个时期还造成了农民的生存危机，因此引起了大量的农民反抗。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民主意识的进步，沉重的税费负担与急剧的社会分层和贫富分化使得农民的反抗异常尖锐，农民的政治认同问题变得相当突出，影响着政权的稳定和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新世纪初，党和国家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实施了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给农村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为消解农民反抗并提高农民政治认同奠定了政策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根本的是要建立起农民稳固的政治认同。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原因，农民的政治认同在改革以来却呈现出弱化的倾向，这种弱化倾向是农民内心的被剥夺感、被歧视感、被抛弃感和挫折感累积的结果。^① 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所面临的相对剥夺下的贫困、城乡隔离中的低能、民主权利虚化后的弱势，成为提高农民政治认同的主要障碍，^② 社会中也因此存在着冲突的隐患，这种隐患一旦被政治激进主义利用，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使得如何避免农民反抗、提高农民政治认同，成为执政党和心系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人所普遍关心的问题。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对农民反抗与认同的研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反抗与认同的重要性，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国外学者对农民反抗和革命的政治行为以及农民政治态度和政治心理及行为模式、农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代表性的著作有米格代尔的《农民、政治与革命》、巴林顿·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沃尔夫的《20 世纪农民战争》、沙宁的《尴尬的阶级：发展中社会的农民政治社会学》、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和《弱者的武器》、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波普金的《理性的农民》等，他们关注的重心和焦点在于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反抗或革命为何会发生，以及如何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其中，米格代尔从行为选择理论入手对农民革命因素进行研究，他从结构—行为选择角度把传

^① 彭正德：《我国转型期农民政治认同的弱化倾向探析》，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 年第 3 期。

^② 彭正德：《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政治认同：类型、基础与影响因素》，载《兰州学刊》2007 年第 3 期。